

新學衡

· 第一輯 ·

主編 朱慶葆 孫江

N E W C R I T I C A L R E V I E W

南京大學出版社

新學衡

· 第一輯 ·

主編 朱庆葆 孙江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New Critical Review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学衡·第一辑/朱庆葆,孙江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305-17417-9

I. ①新… II. ①朱…②孙… III. ①学衡派-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242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新学衡(第一辑)
主 编 朱庆葆 孙 江
责任编辑 李探探 张静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351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417-9
定 价 4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新学衡》编委会

主 编：朱庆葆 孙 江

副 主 编：李里峰 李恭忠 武黎嵩

主编助理：王 楠 闵心蕙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谦平 杜骏飞 胡大平 孔繁斌 闫小波 沈卫威

唐正东 王守仁 王月清 吴 俊 徐小跃 徐兴无

颜世安 杨金才 张伯伟 张凤阳 张 生 周晓虹

开 卷 语

一九二一，西潮滔天，駸駸乎有席卷神州之势。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前贤君子迎风而立，如砥柱中流，结学衡杂志社，翌年刊行《学衡》。揭槩旨趣曰：“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卹思；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嫚骂，以培俗。”学当融汇中西，思必究竟真理；求善求真，尔雅温文；衡史造士，移风易俗。伟哉，斯言！

二〇一四，斗转星移，区域化与全球化，交互碰撞。南京大学后进承继学衡传统，设“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旋更名为“学衡研究院”。畛域其尚宏阔，术业务求精；旧义新篇，靡曰不思，要皆言之有物：或曰概念史，或曰文化记忆，或放眼中西，或聚焦东亚，梳理知识之谱系，前瞻学术之大势，预流国际前沿，树立本土风范。谓其主旨曰：“全球本土化”。洋洋洒洒，道术相济。噫嘻，新矣！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学衡者，学术之公器也。愿与同道共勉之。

目 录

学衡派研究

白璧德与“学衡派”

——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王晴佳） 003

柳诒徵与日本（野田善弘） 033

所见者大，独为其难

——解读柳诒徵先生《国史要义》（武黎嵩） 045

南朝宋武帝初宁陵、文帝长宁陵地理位置补论

——重温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的相关考述（杨晓春） 060

特邀演讲

《我是猫》中猫的毛色（小森阳一） 067

新潮·旧潮

假物得姿

——如何捕捉历史之风（罗志田） 085

儒学叙事下的中国史

——以明治时期日本的汉文中国史著作为中心（黄东兰） 097

当日本史书遭遇中国

——赖山阳《日本外史》在中国的流布（蔡毅） 120

清季启蒙人士改造民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张仲民） 131

鲁迅侧影

——读橘朴《与周氏兄弟的对话》（孙江） 171

南 雍 艺 海

李瑞清先生艺术作品 191

玉梅花庵葬书魂

——李瑞清先生的书法艺术（李昕焱） 194

中 外 比 较

天主教第一位国籍主教罗主教之名、字与生日的新发现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罗文昭主教墓志铭之初步研究（宋黎明） 199

玉川考略

——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及其国学与文人茶著作之间的关系（Stephen J. Roddy）
219

抒情的文言文

——《玉梨魂》的叙事与文体（中里见敬） 230

学衡派研究

新学衡

白璧德与“学衡派”

王晴佳*

——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虽然与清末思想界的潮流(如今古文之争)有衔接之处,但在当时还显然是一场轩然大波。其主要原因是,以胡适、陈独秀和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学者,以西方科学主义为武器,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口号,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提出了一种新的、全面的解释,引起了不少学人的担忧。饶有兴味的是,对这一科学派加以强烈质疑的人中,不但有拥有旧学背景的人士,更有一批与胡适等人有相似的西式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学者,如吴宓、梅光迪和汤用彤等。他们从“新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以东南大学为教育基地,以《学衡》杂志为基本园地,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现代价值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估量与解读,其态度与上述科学派的学者几乎针锋相对。

为什么这些有相同教育背景、又处于相同时代的学者,能对传统与现代的转化这一同样的问题采取如此泾渭分明的态度呢?近几十年来,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已经对“学衡派”做了一些研究。而最近几年,随着对二十世纪“新儒家”的重视,有关兴趣变得愈益浓厚。^①可是,就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似乎比较侧重于传统思想史的研究,重视“学衡派”与科学派在思想和观念上的对立,而对于其思想渊源及学术背景,也即这些对立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尚未充分注意。本文的写作目的,是想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学衡派”人士的教育背景,特别是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老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的“新人文主义”的经历以及“新人文主义”在美国的产生和影响,做一较为细致的爬梳和整理,由此来窥视“学衡派”所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态度之动机与原因。为此目的,本文写作的重点不在详论“学衡派”的学术思想,而在探究这些学术思想产生的原因与背景。这一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想了解白璧德提倡“新人文主义”的背景及其影响;二是想解释梅光迪等人推崇“新人文主义”的动因以及他们在中国宣扬“新人文主义”的成败之原因。

*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有关“学衡派”的主要论著有:Richard B. Rosen, *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 Culture and Literary Movements of China in the 1920's*, Ph.D. Dissertation, UC Berkeley, 1969; 林丽月:《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第383—402页;Chien Hou(侯健), *Irving Babbitt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UNY/Stony Brook, 1980; 沈松桥:《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4年;张文建:《学衡派的史学研究》,《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35—41页。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台北: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年)对学衡派与梅光迪的关系也有论述,但与其英文博士论文大致相同。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台北:立绪文化,2000年)反映了当代中文世界对学衡人物的再度兴趣。类似的著作,特别是随着《吴宓日记》刊行以来的传记等,更是层出不穷。因为许多作品并非学术著作,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一、白璧德其人其事

美国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对东方文化的爱好以及与其中国弟子,也即“学衡派”之间的联系,已经是中美知识界的一种常识。但是其中的究竟,却仍然不是十分清楚,特别是有关白璧德本人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在研究“学衡派”的中文著作中比较笼统,而对白璧德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语焉不详。^① 中国有些学者认为白璧德“贵”为美国高等教育之龙头、哈佛大学之教授,他在美国文学评论界乃至美国学术界之主流地位自然毫无疑问。^②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虽然“学衡派”的主要成员都是白璧德的弟子,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态度,则早在留学美国以前便已成型,“新人文主义不过是为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提供了一套更具现代色彩的理论依据而已”^③。这两种拔高或者轻视白璧德与“学衡派”之关系的做法,自然都有其缺陷。以后一种看法来说,有其合理的一面:白璧德的学说的确为“学衡派”提供了理论论争的依据与手段。但若要说吴宓、梅光迪等人以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在赴美留学之前便已经决定抱持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则似乎很难让人信服。正如胡适与杜威“实验主义”的紧密关系,“学衡派”的主将对“新人文主义”也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利用”而已。如果说胡适一生都没有跳出杜威科学主义哲学的藩篱,那么“学衡派”主将对白璧德的崇敬,则更甚。据 Richard B. Rosen 的研究,梅光迪对于白璧德之崇拜,可以说是五体投地、始终不渝,他甚至视哈佛和白璧德为他的“庇荫和营养”(shelter and sustenance),寄托了所有的希望。一直到白璧德去世三年后,梅光迪才郁郁不欢地回到了中国。^④

如果我们承认白璧德对“学衡派”有重要影响,那么就必须将白璧德和他的学说置于当时的时代,做深入的研究。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欧文·白璧德的生平与学术。白璧德,1865 年生于俄亥俄州(Ohio)的德顿市(Dayton),之后举家又相继搬到了东部的纽约和新泽西州。白璧德的父亲是一位自封的医生,热心科学和教育,同时热衷社会公益,兴趣十分广泛。母亲则在白璧德年仅十一岁时就去世了。白父虽然热心公益,但对子女却并不特别关心。妻子死后,他就将白璧德和他的兄弟姐妹送到了俄亥俄州的亲戚家。父亲的做法,自然对年幼的白璧德有很大影响,但就总体而言,主要是一种反面的影响。白璧德长大后所从事的一切,似乎都与其

① 英文有关白璧德的著作不断出现,但对于白璧德与中国、东方文化的关系,则只有他的一些中国弟子所写的零星文章,如下面会提到的梅光迪的一些英文文章和 Hsin-hai Chang(张歆海),“Irving Babbitt and Oriental Thought”,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4 (October 1965), 第 234—244 页。Rosen 的博士论文 *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以梅光迪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白璧德的研究也较简略,只有十几页而已。侯健的博士论文 *Irving Babbitt in China* 以白璧德为专题,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从思想观念上做了一些比较(见第 64—118 页),但似乎不及张歆海的文章深入。

② 中文学术界对白璧德在美国学术界之地位的认识,主要基于梅光迪等人的溢美之词,很少深究。一般人喜用“新人文主义大师”这一称呼,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白璧德的学术影响。

③ 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40 页。

④ 有关胡适一生未改其科学信仰和治学方法,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 年,第 145—153 页。有关梅光迪对白璧德的崇信与依赖,见 Rosen, *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第 100—109 页;引语见第 107 页。

父在唱反调:他的“新人文主义”虽然有宗教的一面,但他却不愿像他父亲那样成为教徒;父亲崇拜科学,热衷科学实验,而白璧德却对这种科学主义十分鄙视。甚至,他之所以不读博士,据他的弟子即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白璧德讲座教授 Harry Levin 的猜测,也与他父亲自封“医学博士”(M.D.)的做法截然相反。^① 因此,白璧德之提倡“新人文主义”,与他幼时的生长环境有关。白璧德幼年时,他不但远离父亲,还经常在夏天去外地度假,有段时间还在堪称美国大西北的华渥明州(Wyoming)跟他叔叔一起放牧,体验了一段时间的牛仔生活。白璧德这种丰富又艰辛的生活经历,在他的为人处世上留下了痕迹,使他变得性格倔强,不愿轻易流露感情,但又十分执着,有百折不挠的精神。^② 这些个性对白璧德一生之宣扬和坚持“新人文主义”,显然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他的中国学生如吴宓与梅光迪在为人处世上,也带上了乃师的风格:不苟言笑、执着专致和严肃认真。^③

白璧德在高中成绩优秀,毕业时作为毕业生的代表在典礼上发言。但毕业之后,他却并没有立刻上大学。直到二十岁那年,他才在叔叔的资助下,去了哈佛大学。在哈佛求学期间,白璧德的思想逐渐成型,以后也没有多少改变。这与他在当时培养的学术兴趣有关。^④ 与当时的风气不同,白璧德虽然对欧洲语言感兴趣,学了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但他真正的兴趣则在古代语言,对拉丁语和希腊语用力甚深。同时,他也开始对东方文化与语言产生了兴趣,特别是佛教和儒教。但他真正开始认真学习东方文化,则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从哈佛毕业后,白璧德去了蒙太拿州(Montana)的一所大学教希腊语和拉丁语,积攒了一些钱,然后到了巴黎,跟随列维(Sylvain Levi)学梵文和巴利文。一年之后,他回到哈佛上研究生,又跟随蓝曼(Charles R. Lanman)继续学梵文与巴利文。白璧德一生都没有放弃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到了晚年,更是认真。他在1927年曾撰有《佛祖与西方》(Buddha and the Occident)一文,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将佛教的《法句经》(Dhammapada)从巴利文译成了英文,由他妻子整理在1936年出版。他妻子写道,该译著的出版是“欧文·白璧德毕生研究佛教的结果”,可见白璧德对佛教之浓厚和长远的兴趣。^⑤ 对儒教,白璧德也同样很有兴趣,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学习中文。

① 参见 Harry Levin 的就任白璧德讲座教授的讲演, *Irving Babbitt an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第12—13页。Levin 甚至认为白璧德父亲的 M.D. 不是 doctor of medicine, 而是 doctor of magnetism, 后者可以指催眠师, 类似中国的江湖郎中。

② 有关白璧德的父亲及白璧德与父亲之关系, 详见 Stephen C. Brennan & Stephen R.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7, 第2—10页。还可参见 Thomas R. Nevin, *Irving Babbitt: An Intellectual Stud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第5—6页; J. David Hoeveler, Jr., *The New Humanism: A Critique of Modern America, 1900—194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7, 第5页。

③ 有关吴宓的性格, 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年)一书出版以来, 已经有不少论著可参考。《吴宓日记》也自然是有价值的资料之一。但当事人的描写, 更为生动, 如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杂志《人间世》的《吴宓(号雨生)》的译作(温源宁原作, 林语堂译), 就写道: 吴宓“容貌非常端肃, 对事非常认真, 守己非常严正”。收入《未能忘却的忆念》,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 第118—120页, 引语见第118页。有关梅光迪的认真性格, 可见 Rosen, *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第102页和该页的注13、14。另可见《梅光迪文录》(台北: 联合出版中心, 1968年)所收的回忆、悼念文章, 如顾立雅称梅“严厉而又令人敬佩”, 贺昌群称梅“高华”和“狷洁”等, 见第15页和第23页。

④ 见 Nevin, *Irving Babbitt*, 第6页。

⑤ 见 Loeveler, *The New Humanism*, 第23页。

因此他对儒家的了解,主要通过法国汉学家的著作及《论语》和《孟子》的译本。对此,他有所遗憾。白璧德曾经对他的弟子梅光迪表示,如果他能再年轻三十岁,就会学习中文。^①由此看来,白璧德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东西古典文化,以希腊、罗马为主,辅之以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儒教。这一学术兴趣,是他立学的根基,也是他提倡“新人文主义”的主因。

白璧德的兴趣,与当时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倾向不符。以哈佛大学来说,艾理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担任校长以后,对课程要求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选科制”(elective system),让学生自由选课,不再硬性要求他们修传统的基础课程。这一改革的结果是,原来一些被认为是经典的课程成了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设计大学的生活。在白璧德到哈佛以后不久的1883年,外语的必修课只剩下法语和德语,而古典语言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却少有人问津。^②对于这一教育改革,大多数学生非常欢迎,但白璧德则十分反感。因此他虽然进了哈佛的研究生院,但却不屑于攻读博士学位。他在研究生院时的好友、另一位“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穆尔(Paul Elmer More),也对博士学位没有兴趣。David Hoeveler曾写道:“白璧德在哈佛学习了足够的时间,使他获得了硕士学位。但他决定不念博士。这是他对公认的学术规范所做的长期反抗的一个最初表现。”^③这一“反抗”的具体表现是,白璧德选择不读博士,而是去了巴黎,学习梵文与巴利文。^④有趣的是,白璧德的中国学生如吴宓、梅光迪和汤用彤,除了张歆海外,也都以获得硕士学位为满足,而没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打算。而梅光迪之不念博士,还违背了其留学美国的初衷和他父亲的愿望,可见其受白璧德影响之深。^⑤曾经上过白璧德的课,并像白璧德一样在哈佛跟随蓝曼学梵文与巴利文的陈寅恪,甚至对硕士学位都没有兴趣。“学衡派”中的刘伯明,其博士学位来自美国的西北大学。而另一位博士胡先骕,虽然哈佛毕业,但他的专业是植物学。张歆海是跟随白璧德念的博士,起初也与梅光迪、吴宓等人志同道合,但他在回国以后就与胡适接近,并没有为《学衡》写稿。^⑥梅光迪、吴宓对学位的看法,与胡适有很大的不同。吴宓尝言:“吾国留学欧美之学生,有专骛学位,而国中之人亦或盲敬之。吾则视之为欺世盗名,以为此种心理,与昔之科第功名何异哉!故常谓,吾辈取人,但当究其实在之蕴蓄,而不必问其有无学位可也”。^⑦吴宓此言,也许有感而发,因为在他与胡适

① 见梅光迪的回忆,收入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eds. Frederick Manchester & Odell Shepar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1, 第120—121页。

② Nevin, *Irving Babbitt*, 第84页。

③ Hoeveler, *The New Humanism*, 第8页。在该书的第11页还说道:“像白璧德一样,Paul Elmer More在哈佛也拒绝上博士课程。”

④ 见 Frank J. Mather, Jr. 的回忆,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第42页。

⑤ 梅光迪之父在梅留美期间,曾写信嘱咐梅“得一博士”,见《梅光迪文录》附录《梅先生尊翁教子书》,第4页。梅光迪初到美国时,也“意欲俟三五年后大学卒業,得有博士硕士等学位”。但从学白璧德之后,便“已绝意于博士衔”,见梅光迪在留美期间致胡适的信,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25、472页。

⑥ 张歆海与白璧德关系,似乎在师友之间。他对白璧德的佛教研究,就有批评,白璧德也有回应。见 Hsin-hai Chang, “Irving Babbitt and Oriental Thought”,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4(Oct. 1965), 第234—244页。白璧德的回应可见他的“Buddha and the Occident”,收入 *Irving Babbitt: Representative Writings*, 第224—270页,特别是第227—228页。

⑦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引自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91—92页。

争辩时,胡适尚未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已经署名“胡适博士”了。^①而吴宓的老师白璧德之选择不读博士,与他提倡“新人文主义”有直接的联系。我们下节会详谈。

白璧德这种我行我素、逆流而行的态度,对他早期学术生涯的发展,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从巴黎回国以后,他于1893年在哈佛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在威廉斯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了一年法语。1894年,哈佛大学法语系的一位教授学术休假,白璧德的老师想到了他,让他来临时顶替,使他开始了在哈佛的教书生涯。然而,白璧德的真正兴趣是教授古典语言,复兴古典文化,但他的这一志愿,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艾理特校长改革教程以后,古典语言已经不再是必修课,需求自然减少。于是,白璧德只能在罗马语言系教低年级大班的法语,批改学生的作文,这使他兴味索然。对这位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的新人文主义者来说,要他在罗马语言系教法国语言、研究法国文学,简直是一种折磨,以他倔强的性格,自然不能忍受。他有次居然对系主任说:“法语是拉丁语的一个廉价和蹩脚的变种”。^②这样的做法,使他在系里十分孤立无援。从1894年到1902年的八年中,白璧德在哈佛一直是一位讲师,且时时还有拿不到下一年聘书的危险。^③

白璧德与他同事的不和,除了他的性格因素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治学态度和方法的不同。受德国学术的影响,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开始走向专业化,推崇专门的学问和提倡运用训诂学—比较语言学的方法(comparative philology),对事实进行考证和批判。顺便一提的是,这一风气以后由胡适、傅斯年带到了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研究的主流。^④而“学衡派”诸公,则追随其师,与之唱反调。因此有了胡适等人与“学衡派”的争论。依孙尚扬的说法,他们的争论是“在南京谱写了白(璧德)杜(威)辩论的中国版”。^⑤由此看来,虽然“学衡派”以文化保守主义著称,以申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但他们的学术观点与胡适等人一样,仍然与西方学术紧紧相连。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详论。

从1900年开始,经过不断抗争,白璧德终于能在系里开设高年级和研究生的课了,因此也就让他着手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他也慢慢有了几位追随者,包括以后成为“新人文主义”干将的薛曼(Stuart P. Sherman)。这些学生人数虽少,但他们的好评还是对他在1902年晋升助理教授带来了好处。^⑥但是,在他以后要求晋升,并提出获得终身教职的申请时,又遭到麻烦。甚至在他于1908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文学与美国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① 胡适要迟至1927年才真正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详情请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1—76页。

② 见 William F. Giese 的回忆,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第22页。

③ Brennan &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第20—21页。

④ 参见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2—628页。

⑤ 孙尚扬:《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国故新知论·序》,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7页。

⑥ Stuart Sherman 对白璧德的学问十分佩服,认为他东西皆通。见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第89—90页。当时与他接近的穆尔(Paul More)认为,白璧德的这些学生对他在哈佛的地位有所帮助。不然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失去他的位置了。同上,第330页。

College)以后,也没有改善他的处境。那时他已经43岁了,在哈佛也已经教了十四年的书,但仍旧是一位助理教授,而与他同龄的同事,则大都已经晋升了。为此,他只能通过他的学生、已经在伊利诺大学任教的薛曼为他争取一张聘书,用来与哈佛协商,又加上几个朋友的帮助,特别是已经在文学评论界崭露头角的穆尔的写信支持,才在1912年拿到了终身教职,并晋升为正教授。^①此时,他已经四十七岁,出版了第二本书《新拉奥孔》(*New Laokoon*),而且已经在哈佛教了十八个年头的书了。不过,虽然白璧德的治学没有被学术界的主流接受,但他上课的精彩、知识的渊博和他提倡“新人文主义”的热忱,也使他名声在外。这也是他最后得以在哈佛立足的原因。^②

白璧德在哈佛这些不快的经历,使得他一生的论著都充满了论争的色彩,似乎永远都在与人争辩、反抗,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中国学生。《学衡》杂志的文章,大致上也充当了一种反对派的角色,与主流思潮相对抗。不过,从那时中国和美国思想界的情况来看,白璧德与《学衡》的主张,也的确代表了一种少数派的立场,因此也就多少影响了他们的写作风格。

白璧德在哈佛当然也有愉快的经历,其中之一就是他在当时的女校——瑞克里夫(Radcliffe)大学(现已属哈佛)教书时,遇到了出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的朵拉(Dora Drew)。毕业以后,他们于1900年结婚,那时白璧德已经三十五岁,而朵拉只有二十三岁。白璧德的婚姻,似乎也与他的中国学生有不少类似之处。梅光迪的夫人,也是他以前的学生,而吴宓之倾慕、追求的女弟子,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十分出名,现在更有吴宓的日记为证。白璧德有这位出生中国的夫人,自然也会增加他对中国以及东方文化的兴趣。比如他的书房里,就挂了不少中国的山水画(有些可能是他中国学生所赠)。他还对旁人说,这些画不仅表现山水,还展现了人的心境和情绪。^③

虽然白璧德在哈佛的经历,特别是最初的阶段,不太顺利,但到了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中期,也就是在他与他的大部分中国弟子接触的时候,他的处境已经有了改善。那时选他课的人数,相对还是比较少,总在十人以内,因此白璧德可以让他们围成一桌,他自己也坐着上课。^④后来他的名声愈来愈大,上课的人数甚至几百人,但他还是习惯坐着上课。他通常带一个鼓鼓的书包到教室,然后把一大堆书往桌上一放,书里夹有大量的便条和笔记。接着他似乎随意地把其中的一本书打开,读上其中一段,然后就开始海阔天空地讲起来。白璧德最乐意做的是,引证不少意味深长的警句,用来不断重复论证他的观点。他的做法,显然与当时强调逻辑论证、逐步推理的学术风气不同,但有意思的是,他还是能经常回到他的论点,让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可是,这样的做法,用来上课还可以,但用到写作,效果就差了。白璧德的学生和朋友一

① 有关白璧德在哈佛晋升的曲折经历,详见 Brennan &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第22—24页。

② 参见 Nevin, *Irving Babbitt*, 第3—24页和 Loeveler, *The New Humanism*, 第9页。

③ 见 Frank J. Mather, Jr. 和 Gordon K. Chalmers 的回忆,收入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第50页,第294—295页。

④ 据白璧德的学生 William F. Maag, Jr., Stuart Sherman 和 T. S. Eliot 的回忆,那时选他课的人,大都在四人左右。见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第61、89、101页。

致认为,他写作的手法不行,常常在那里兜圈子,不断地重复循环,无法引人入胜。^①不过,白璧德的这种论述方法,与东方学问的传统有点类似。我们将在第三节再论。

饶有兴味的是,白璧德在哈佛地位的上升期,正好是他的中国弟子们追随他的时段,如梅光迪在1915年就开始随他上课,以后则有吴宓、张歆海和汤用彤等。但事情也许是相反相成的。白璧德的名声,也显然是在哈佛之外甚至在美国之外。因此,他能受到他的东方学生的景仰,也是他影响逐渐扩大的原因之一。梅光迪甚至说,东方学生是最早推崇白璧德学问的。^②总之,在1920年以后,随白璧德上课的人已经愈来愈多,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充分讨论了。白璧德甚至对梅光迪这样说,“我的学生太多,已经使我穷于应付了”。^③而在这些学生中间,显然有不少是来自其它地区,特别亚洲的学生。在他于1923年在法国讲学的时候,身边就围着不少来自中国、日本、朝鲜和印度的学生。他的朋友穆尔这样评论:“在我们那时,白璧德也许是唯一的一位被东方人认为是智者的美国学者,他也知道如何用恰当的方式接受他们这种对老师的崇敬。”^④除了亚洲以外,白璧德也在欧洲、特别是法国颇有影响。这在他还初露头角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此。^⑤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则有了这样的说法,“白璧德的名声早已离开了剑桥(哈佛所在地名),而走向了全世界”。^⑥

白璧德名声的扩大,除了他自己不断著述出版之外,与他的传业授道关系甚大。他早期的弟子薛曼,就是“新人文主义”的有力推广者之一。薛曼不但帮助白璧德在哈佛立足,自1917年以后,他还出版了不少著作,不但阐述“新人文主义”的理论,而且还以之为武器,联系当时文学评论界的状况加以评论,扩大其影响,因此人们开始关注白璧德和他的朋友穆尔。白璧德的另一一些学生、当时已在大学任教的福尔斯特(Norman Foerster)、艾理奥特(G.R.Elliot)和以后成为英国著名诗人的艾略特(T.S.Eliot),都在当时为推广“新人文主义”作出了不小的贡献。^⑦

白璧德在哈佛的年轻同事马西尔(Louis J. A. Mercier),也在1921年开始用法文和英文介绍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马西尔的《白璧德之人文主义》(*L'Humanisme Positiviste d'Irving Babbitt*)一文在法国出版以后,反响甚好,这也是对“新人文主义”的一篇全面介绍。他的文章在出版以前,也经白璧德过目。^⑧而“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篇文章也有作用。1923年吴宓将该文译出,由《学衡》发表,并解释说,该文的发表使得法国人“皆知有白璧德,皆知有人文主义。吾人从旁逊听,益深景慕之思矣。且其叙述阐明赅括,故不嫌明日黄花,特为译出”。^⑨以后,马西尔又写了不少有关“新人文主义”的评论,并将“新人文主义”称之为—

① 有关白璧德的上课方式和写作风格,散见于他学生、朋友的回忆,收入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② 见梅光迪的英文文章, *Humanism and Modern China* (K. T. Mei), *The Bookman* (June 1931), 第365页。

③ 见 Henry W. Taesch 和梅光迪的回忆,收入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第167、116页。

④ 见 Marcus S. Goldman 的回忆,同上,第238页。

⑤ 见 William F. Maag, Jr. 的回忆,同上,第60页。

⑥ 见 G. R. Elliot 的回忆,同上,第159页。

⑦ 详见 Brennan &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第60—61页和 Hoeveler, *The New Humanism*, 第12—17页。

⑧ 见 Louis Mercier 的回忆,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第193页。Mercier 也知道他的文章被译成中文发表,第194页。

⑨ 见《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吴宓之按语,收入《国故新论》,第1页。

个“运动”。^①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白璧德已经在美国文学评论界占有一席之地了。^②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从此一帆风顺,像他的崇拜者梅光迪、胡先骕在1922年就称呼的那样,成为“美国文学批评家之山斗。”^③相反,白璧德尽管有了不少追随者,但也有不少反对者,甚至他以前的朋友和学生中间,也有人开始与他分道扬镳,如薛曼和穆尔。薛曼不满白璧德对民主和教育的精英主义看法,穆尔则愈来愈对宗教产生兴趣,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尽管与宗教有联系,但他本人还是强调其实证、经验的一面。^④虽然如此,就总体而言,“新人文主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处于一个鼎盛的阶段。白璧德本人于1926年成为法国研究院的通信院士,这在美国学者中并不多见。1930年他还成为了美国人文学院的院士。

1930年5月,受他学生的怂恿,白璧德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与他的批评者做了一场公开的辩论,观众达三千人。这可以说是“新人文主义”走向顶峰的一个标志。可惜的是,由于白璧德在演讲时习惯低头看稿,因此也就无法面对观众,加之扩音器又不好,因此效果不佳。而他的对手则侃侃而谈,显然更胜一筹。白璧德自我解嘲说:“虽然那天很热,但当时的情景却像经历了一场霜冻”。^⑤换言之,观众对他的演说没有表现出热情。白璧德演讲喜欢旁征博引,时而拉丁,时而希腊,对于听众来说,过于高深,也是他失利的一个原因。^⑥那年,他的弟子福尔斯特还编了一本《美国的人文主义》(*Humanism in America*),由白璧德的追随者撰稿,白璧德本人也提供了一篇。但出版之后,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⑦由此看来,虽然“新人文主义”在那时已经为人所广泛注意,但也常常成为攻讦的对象。三年之后即1933年,白璧德便过世了。

虽然“新人文主义”在1930年达到了一个顶峰期,但物极必反,很快就衰落了,可谓昙花一现。白璧德和穆尔在1933年和1937年的先后去世,也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使得人们对于“新人文主义”的精英主义态度,不再有什么兴趣了。他们需要的是更为实际的学说和理论,而“新人文主义”则过于阳春白雪、过于理想主义了。与之相对,杜威的乐观主义、科学主义则显得更切合实际。因此,白璧德与杜威的争辩,最后由经济社会的因素而决出了胜负。^⑧

但是,虽然“新人文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在美国学术界已经绝迹,但白璧德的影响却仍然存

① Louis Mercier 的有关著作是 *Mouvement Humaniste aux tats-Unis* (1929) 和 *The Challenge of Humanism* (1933)。他从法文的原意出发,称“新人文主义”为一“运动”(mouvement)。

② 在当时出版的 *Criticism in America: Its Function and Statu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4) 一书中,就收集了白璧德和当时美国著名文学评论界领袖人物的论文。

③ 见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和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之按语,收入《国故新论》,第36、39页。

④ 参见 Brennan &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第71—78页; Hoeveler, *The New Humanism*, 第19—27页。

⑤ 见 Theodore Spencer 的回忆,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第283页。

⑥ 见 Henry W. Taussch 的回忆,同上,第177页。

⑦ 参见 Brennan &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第75—78页和 Hoeveler, *The New Humanism*, 第25—27页。

⑧ 参见 George A. Panichas, ed., *Irving Babbitt: Representative Writings*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1), Introduction, 第ix页; Hoeveler, *The New Humanism*, 第27页; Brooks Otis 的回忆,收入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第310—311页。